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

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
中共党史教研室

1981.8

目 录

罗明同志在龙岩地区革命史料座谈会上的讲话……	(1)
关于“反罗明路线”的问题……………温仰春	(27)
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一些情况……………徐文伯	(42)
长征中有关命令、文件、资料……………	(45)
李德回忆……………	(62)
长征路上党粉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 斗争……………	(70)
中央给西路军的电报(1936.9—1937.8)……………	(88)
阎锡山阻击红军东渡战役的回忆……………刘奉宾	(99)
红二方面军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斗争 及长征大事记(1934.10—1935.11)……………	(102)
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大事记 (1927.7—1934.10)……………	(153)
红二军团进军贵州及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大事纪要(1934.5—11)……………	(176)
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王 明	(181)

罗明同志在龙岩地区 革命史料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记录稿，未经本人过目，仅供内部参考）

我和陈子彬同志、谢小梅同志，还有苏科长同志到这里是来向闽西老革命根据地同志、各级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表示问候和敬意的，是来参观学习的，李坚真同志本来也要来的，临行前因病不能来了，她一再要我传达对大家的问候！

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作出了二项英明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主席著作第五卷第六卷和全集。第五卷将于今年上半年出版。为了实现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全国人民大鼓干劲。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了今年的四条主要战斗任务：首先是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是今年的中心任务；还有加强党的建设；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一步把群众性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华主席英明领导下，各项工作开始了新的大发展。回顾过去的革命历程对比今天，深深感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对现实路线斗争是有深刻的教育意

义的。

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有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才有新中国的今天，也才有闽西的今天。

下面我想就我参加革命初期的经历和我所知道的有关闽西革命中的一些情况，仅以此极不完整的一个侧面，提供出来，供研究闽西革命史的同志们做个参考，说得不对地方，请大家更正、补充。

毛主席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福建有九个同志参加学习，这是福建闽西革命的火种之一。秋收起义后，毛主席由井冈山亲自率领红四军三下闽西，开辟和扩大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后在中央苏区又打败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反革命“围剿”，使闽西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发展起来，这是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闽西广大党员、革命人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

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主席出席了大会，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总结了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经过斗争，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合作，接受了毛主席的提议。这次会上，毛主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负责领导中共两广区委工作。一九二四年，周总理从法国回来后，在两广区委任书记，后任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一月，我到福建招收全国农讲所学员，回广州后也在两广区委宣传部当

秘书。这时两广区委书记是陈延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周恩来总理和陈延年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陈延年书记曾在区委会上说：“那个老头子（指当时党中央书记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的力量，从血统上讲，他是我的父亲，从党的组织关系上说，我是党员，反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观点，叫他回广州看看工农运动的力量吧！”陈延年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思想的。

省港罢工，二次东征和北伐，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发动的。是我党领导和推动的。毛主席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们学习后，对社会关系开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我原来在厦门集美师范部读书。一九二四年陈嘉庚办的集美学校有数千人学生闹风潮，反对校长叶渊，原因是校长不准学生示威反日，有一个由厦门来集美读书的学生名叫李文华，被军阀开枪无辜打死了。集美学生要求到厦门示威，受到校长叶渊的压制。这一年暑期，学生到校主陈敬贤（陈嘉庚胞弟）家中请愿，全校学生不走，叶渊只好从校主家阳台上走出来，向大家伪称明天就辞职，校长由校主另任。学生没有斗争经验，受了欺骗，斗争一时松弛下来，第二天，校方宣布开除杨广智杨春仁二人，不久又开除郑日晖张旭高等七人。当时我是一个班的学生代表。因此先离开学校回广东，在汕头遇到一个中共两广区委共青团的领导干部兰裕业，他劝我回集美，说闹风潮正说明学生有力量。但没有领导核心，要我回来组织国民党左派。我回集美后，才知道校方并没有开除我，就在那里照常读书活动，组织国民党左派。到了一九二四年寒假期间，发展了一百多个国民党左派，成立了领导机构，还出

版了《星火》周刊。

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条件是：一、拥护共产党；二、赞成国共合作；三、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右派，左派在师范部较多。读师范的一般大都是家庭比较困难的贫苦学生，每月领伙食费四元钱，一元零用钱。念师范的学生大致不希望升大学，也有个别师范生考大学的。闽西有很多师范生，如永定的陈正、曾牧春、卢肇西、卢其中等，上杭的张凯、兰为仁、兰为龙等，龙岩的陈国华、张旭高、谢宝萱等人，这些人先后入了党，以后在闽西革命斗争中都起了很大作用的。

一九二五年春恢复了全校学生会。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学生自动提出召开追悼大会，声势更大了。到了“五一”节开纪念大会。所有师生校工和校外的筑路工人都参加了，学校当局更为害怕，要追查发动人，怀疑是我干的。师范部主任李进忠（安溪人，与叶渊同乡）找我谈话，要我退学离校，说学校可以提前给我毕业书，我不要读书了。后来校内左派开个秘密会研究，说我可以先走，并即写信请两广区委派人来领导。我写信后，两广区委即派兰裕业来了，他后来先到厦门找罗扬才（大埔人）和李觉民（永定人），又到集美找刘瑞生，发展了第一批团员共八人，在集美学校建立了闽西闽南第一个团的支部。归中共两广区委领导。这年下半年，李觉民去广州开个什么会，罗扬才也去广州出席全国学生代表会议，他们二人就在广州加入了共产党，回厦门后，对国民党右派开展统战工作。接着，两广区委又派罗秋天从广州到厦门，由他们三人成立了福建第一个党支部，后来发展党员，又成立了党总支。

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离开集美，经汕头回到广州，本来想

进短期学习班学习，两广团组织要我去考广东大学理科（校长邹鲁、国民党西山派），从事学生运动。开学后我就进了团，不久又进了党。在广东大学只有半年时间，我兼省港大罢工的记者，又兼两广团区委的宣传工作，没读什么书。这年冬天，毛主席筹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向全国招生。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派我回厦门招收学员，并指示我要扩大党团组织，争取国民党左派，分化打击右派。我回厦门后，正遇上国民党要成立福建国民党党部，左右两派斗争很激烈，我们便通知上杭林心尧、张凯和阮山等人来厦门参加开会，并发展林、阮入党。当时左派占了相当的人数。林心尧、张凯和阮山等人后来又派回当地开展工作。

关于农讲所，以前五期是广东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第五期也有福建永定的赖玉珊和赖秋实二人去学习，回原乡工作后，我曾去联系过，找不到下落。第六期才改向全国招生，那时农讲所的名单是不公布的，来招生是挂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名义，国民党才不敢干涉、农民部长是共产党员林伯渠。当时闽西南属中共两广区委领导，闽北属上海中央领导，原计划在闽西南招生十五名，后来只招到九人，就被国民党右派陈伯达等人发觉。陈伯达那时名陈尚友也是集美学生闹风潮时躲在厦门。是国民党反共分子，在厦门时曾组织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写反共文章，猖狂地辱骂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叫嚣要把这个“妖怪”，“一扫而光，”妄图消灭共产党。我回广州后，有一次遇到陈伯达，他对我自称同学，我怀疑他为什么突然到广州，不久我在上海出版的《洪水》杂志上看到陈尚友文章，提到打倒共产党，内容极为反动，为了击退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叫嚣，一九二五年十二

月毛主席在广州亲自主编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并发表了许多政治论文，对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深刻的揭发和坚决的斗争。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了反革命的宣传。

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干扰破坏，我在福建只招到九名农讲所学员，这九人是：龙岩的郭滴人、朱文昭、李联星、陈庆隆（现名陈子彬，那时仅十六岁，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团员），上杭的温家福、王奎福，永定的胡永东（前不久在云南病死）。平和的朱积垒，诏安的黄昭明。除陈子彬是厦门中学学生外，其余八人都是集美学生。我于三月间在厦门送他们上船后，没有再招了，就在厦门一个工人家中隐蔽下来。九人于三月二十日到达广州，我以后才赶到。五月开学，半年就毕业了。他们在毛主席直接培养教育下，在农讲所都先后入了党。毕业后又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由汕头地委派到闽西工作，是随北伐军进福建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直接到农村发动群众，做农民运动工作。

第六期农讲所学员共有三百余人，进行了政治军事教育，路线教育，准备搞武装斗争。毛主席任所长，还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并专题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周总理也讲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问题。毛主席以武装斗争的光辉思想教导学员，组织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后湖南的学员配合北伐军，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先锋挺进长沙，打下武汉，起了很大的作用。

闽西闽南党的工作，原由汕头地委领导，北伐军入闽后，工农运动发展很快。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中共两广区委派我由汕头来厦门成立市委，书记是罗秋天，组织部长是罗扬才

(兼工人工会委员长)，宣传部长是吴世华(厦门人)。接着，我又到漳州开党员扩大会，成立了闽南特委，我任特委书记，刘瑞生任组织部长，翁振华(台湾人)任宣传部长，工人委员会是许士森(印刷工人)，妇女运动委员是夏淑娟。根据扩大会的决议及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在漳州也吸取广州农讲所的经验，开办了工农运动干部养成所，招了一百多个学员，准备搞武装斗争，王占春同志就是漳州工农运动干部养成所学员之一。林心尧在上杭也办了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其它各县也采用各种不同形式办了讲习所或养成所。漳州的陈卓凡(左派)，龙岩的张旭高(左派)，汀州的谢秉琮(原党员)都是当时国民党的监察专员，对各地举办农讲所、养成所支持很大。

那时为什么不成立福建省委呢？原因北伐军进入福州后，当时上海中央曾派王荷波为特派员来福建和我联系成立省委事，我们也到福州找了市委的同志研究。王荷波看出福州市委很复杂，内部不团结，选个领导也争论不休，定不下来。于是经研究还是不成立省委为好，由福州厦门两个市委分别领导闽北闽南各县工作更为有利。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三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屠杀工人数百人。他们三月份就决定叛变，厦门反动派则在四月九日先下手，罗扬才(厦门市委组织部长兼总工会委员长)和杨世宁(厦门市总工会副委员长)被捕。当时厦门工人纠察队不断示威要求放回这两个人，可是反动派秘密地用船把他们解送到福州杀害了。罗杨两人英勇不屈，沿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壮烈牺牲了。由于厦门市委是秘密组织，公开活动只是工会、农会，敌人找不到党的线索，市委除罗杨二人

负责人被捕外，其余未受损失。我在漳州知悉后，立即停止养成所工作，把学员分散到农村。在这以前，我们早有警惕，提出要提防国民党右派，提防蒋介石叛变，因为看到一张日文的台湾报纸刊登中国将发生反共政变的新闻。厦门“四九”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赶到厦门处理事后，调整了厦门市委干部，由刘瑞生当书记，工会转入隐蔽活动。厦门、漳州处理好以后，又怕闽西出问题，闽南特委研究决定，由特委秘书长邱伴林为主成立联络站，重要事情才和我联系。我和罗秋天两人就赶到闽西，首先到了永定的下洋，因为下洋有广州农讲所回来的胡永东在那里活动，就以下洋为据点，发展了一批党员。五月初，我又赶到上杭城。当天晚上在一个中学生家里召开紧急支部大会，开会时，突然听到枪声，立即疏散撤退。（以后才知道这天晚上枪响是反动派要抓左派，要抓傅柏翠、张凯等人。）这时城门关闭，反动派挨户搜查抓人。我当时想自己是个教师，没关系，但学生的母亲很害怕，走来走去，那个学生怕因此坏了事情，劝我走。第二天我爬城墙从北门转到南门，看到城门前围了许多人，我就混在群众中，原来是反动派在一棵大榕树下枪杀张凯（左派、集美第五届学生），又看到包究生、周继英二人在南门城下被杀头，我立即经东门水西渡回到下洋。这时林心尧在上杭所组织的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已被迫解散，林心尧本人退到武平时也被捕牺牲了。

这时，永定的下洋有曾木春、陈正等人在那里教书，阮山在湖雷也成立了支部担任书记，我们考虑下洋、湖雷都有了支部，但永定的溪南里没有党员。刚好张鼎丞同志在大埔教书，他是溪南里人，我和阮山商量要张出来，回溪南里

去。原来张鼎丞同志入党问题早已培养成熟，不过未办手续，于是约张来湖雷，在一个山口里面和张谈话，劝他回溪南里，还以小学教师名义为掩护，搞群众发动工作，并办了入党手续。张鼎丞同志态度十分坚决，表示回溪南后有把握发动群众搞好运动，于是由大埔县委书记饶龙光派张鼎丞同志回溪南里。不久，张鼎丞同志要求派干部去溪南里，党即派罗秋天去。罗到溪南里后开了全县党员大会，成立了永定县委，并任县委书记。接着我到龙岩，找到陈庆隆（即陈子彬），住在他家里，听说有两个党员被捕，我和陈子康（后期叛变）研究设法营救，结果没有成功，又回到永定下洋，这时接到漳州来信，要我赶回漳州成立福建省委，当时形势紧张，陈独秀与汪精卫已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彻底叛变革命。湖南军阀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屠杀工农，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有十万农军手执武器包围了长沙。但是，陈独秀却害怕触犯国民党右派，竟强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结果使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摧残。以后刘少奇在湖北又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枝弹药拱手交给国民党。陈独秀之流不仅自己镇压工农运动，还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那时有的人感到共产党没有力量，悲观失望，有的离开了共产党，这时毛主席与周总理都在武汉，周总理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陈明与陈招礼二同志从武汉党中央来福建恢复党组织并成立福建临时省委，指定陈明同志为省委书记，陈招礼为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我们在漳州附近的南靖一个有温泉的地方开个扩大会，成立省委。这是一九二七年七月间的事。王海萍是省委常委，潘珍敏（陈招礼妻子）做妇女工作。临时省委成立后设在漳州

（后又改为福州、厦门二个中心市委）。

临时省委成立不久，我从报上获知南昌起义消息，起义军向赣中赣南发展，省委派我去迎接起义部队，请起义军来闽西，我就跑路经龙岩去上杭。到上杭，发现兰玉田的部队自动撤退，也知道起义部队已到了汀州，于是就在上杭城外等。不久，周总理带了一个团的先头部队到上杭城，住在伪县党部机关（按：今为上杭实验小学）。总理当时是前委书记，以前我们就认识过，在上杭县遇到后都很高兴。总理讲了这次南昌起义的目的意义，想打潮汕和海陆丰，交给我们四个任务，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粮食供应，三是情报，四是收留伤病员。当时最困难的是群众不了解这是共产党的军队，群众家的门都关了，要渡河找到船又没有船工，群众不出来，后来我们找党的组织和当地的左派，也叫傅柏翠出来做工作，经多方说服，船工出来了，小船把起义军的物资和伤病员一站一站送到峰市。交通解决了，粮食就开地主的谷仓，由群众加工后让起义军装走。伤病员在长汀时傅连璋的医院就收了一部分，陈赓同志就住过那个医院。周总理对我说，这次来是有路线斗争的，陈独秀和张国焘是反对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起义军在南昌成立了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谭平山、彭湃、郭沫若，张国焘等大部分都来了，宋庆龄挂个名，人没有来。起义部队枪很多，一个人都挂了二、三条，还发了一些枪给我们，我们提出还要，他们说要带到海陆丰去武装农民。以后朱老总带的第九军也来了，（周士第这时是第二十五师师长）指挥部设在南门汀江对面土岗的一片房子里，我们从南门浮桥过江找过他，哨兵老远就问“什么人，干什么的？！”戒备森严。在上杭南门城墙附近一个大坪上

还开过几千人参加的欢迎起义军大会，郭沫若同志代表起义军在两棵大榕树之间临时搭起的一木台上还讲了话，他那时是宣传委员会主任，说话很风趣，手势很有力，他说我们起义军已把朱培德右派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讲到这里突然下来问我厕所在那里，说他今天拉肚子，他屁股下面也要“落花流水”了。

起义部队走后，我们才离开上杭城，在城外等潮汕方面的消息，等了很久，我自己又赶到峰市对面的河头城找温家福，要他带我的信赶去找朱老总联系。到武平与江西交界的地方，温家福才带回信说，起义军不回来了，往大埔三河坝走了，地方武装要我们自己搞，我们就把枪运到上杭北四区设一个据点，又在卢丰设一个点。这时省委已由漳州搬到厦门。不久，我们收到“八七会议”一个文件——《告全党党员书》，知道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八七会议”在汉口开，有个国际代表叫乌米那卡（苏联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号召全党从大革命失败中吸取教训，指出党应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会后毛主席即赶回湖南，准备武装斗争。在与陈独秀错误路线斗争的同时，党内形成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曾在苏联当过记者，有国际代表支持他，蔡和森同志本来留在中央工作，看到瞿秋白盲动，搞宗派主义，不愿留下来，要回湖南。毛主席到湖南后，即领导了九月秋收暴动，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十月到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建立了井冈山

根据地的消息传来后，对我们影响很大，决定也搞暴动，我们告诉了上杭北四区与卢丰点要想法连成一片。金砂、南溪、陈东坑也都准备暴动，当时南昌起义军还留下一个武汉军官学校毕业的军官在上杭组织农民武装。上杭布置后到龙岩，要白土后田也要学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我们在金砂溪南里还以防盗名义打了些土枪准备发动暴动。之后又到平和找朱积垒同志商量搞武装暴动事。这人很坚强，他把点设在平和西门，我建议设在长乐乡，因为西门离城只有十华里，太近了。陈子彬、张旭高已经入党了，也到过长乐乡工作。这时瞿秋白搞“左”倾盲动主义，急于攻城，也受了点影响。和平的反动派到长乐乡抓了三十多个人当挑夫，挑完后不能回家，把人关在监狱里准备下次再挑。长乐乡农民很气恨，打到县城去，把人抢出来了。由于农民组织性不强，攻进县城后不能马上集中，结果被反动民团反攻了，朱积垒受伤，队伍撤回长乐乡，敌人跟着就来打长乐乡了。以后省委讨论，共同肯定了武装斗争的意义，但农民攻城要有必要的准备，各县要做好城外的农民工作，条件成熟了才能攻城，其它各县不要急于攻城，要有计划有准备地开展武装斗争。

一九二八年春，我回到厦门临时省委。省委讨论后提出我来担任书记，陈明任宣传部长，请示中央。中央认为我闽西情况熟悉，也要我担任省委书记，这年的三月间，中央通知要开会，开什么会，什么地方开都不懂，省委选我和许士森（漳州印刷工人）还有一个团的代表叫孟坚去参加，三人到了上海等了很久，后来又回到东北的辽宁转了一大圈，最后从满洲里边境爬过一座大山偷越过去，原来到莫斯科开党的“六大”，会议由周总理主持，组织得很好，当时他是中央的组

织部长。张国焘和瞿秋白也去了，是批判的对象。也通知了陈独秀，但他不来，那时他还没有被开除。总理很坚强，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肯定了武装斗争，肯定了苏维埃工作，点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还提到毛主席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今后工作的方向，还提议毛主席当中央委员，各省代表热烈鼓掌拥护。“六大”在莫斯科郊区的中山大学开，由六月中旬开到七月中旬。布哈林来大会作报告，是王明翻译的，布哈林的报告是经过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讨论通过的，叫布哈林来报告，并不影响党的“六大”。这次大会有斗争，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宗派集团为什么选向中发当书记？他原是武汉的工人，那时表现还好，共产国际提出要增加工人领导成份，由工人出身的来领导，以后回国就不行了。李立三这人会说也会写，被选为秘书长，后来中央开会总是李立三报告发言，向中发就说我完全同意，一切由李立三操纵了。莫斯科“六大”会议还没有开完，工人代表许士森因患肺气肿病医治无效就死在高加索了。那时周总理不知听什么人说我有右倾，问我要不要留在苏联学习，我说开会就是学习，还是回福建传达，参加闽西革命斗争。总理同意了。我们就从苏联海参崴到哈尔滨回到上海。孟坚回国后留在东北工作，后改名孟用潜。我到上海后，听党中央秘书处一个人告诉我，福建开了省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福建省委，中央派郑超麟（漳平人，陈独秀派）来参加会议，选了刘乾初（山东人）当书记，刘乾初我以前在漳州工作时认识他，后来调到山东当省委书记时牺牲了，他走后我又接他当省委书记职务。

我先到福州向省委传达“六大”决议，没有文件，只能靠自己记忆传达。这时有个林烈（后来名林默涵）在福州工作，他记录得很好。后来根据他的记录稿了个文件。福州传达后就到厦门传达。以后陈柏生（团省委书记）同我一起再去闽西传达。经过永定的歧岭，在合溪开了三县扩大传达会，一路上开了小规模传达会，到龙岩后陈柏生回厦门，邓子恢同志又陪我到闽西其它各县传达。那时候闽西特委决定，我们到达之前，特委机关搬到白区坎市，我特别交代范炳元（张老的过房弟弟）要做好秘密工作。但我们一到上杭就听说机关被破坏，特委书记郭一平（原名郭茂亮）逃跑了，特委李西挺等二人被抓杀了头，敌人还强迫范炳元挑着二个人头到县城示众，到了县城连范炳元的头也被杀了。我到上杭时，有人对我说，大家都传说是我的头被杀，因为有个个人很象我，那时斗争十分残酷。在上杭传达后，上杭总支的罗大准和李力民提出意见，说上杭县委现在游击区，县里是总支，领导长汀总支有困难，要我们再到长汀传达一下，还说长汀同郭凤鸣斗争很激烈。但没有人带路叫我顺着电杆走，路上遇到一个卖油的商人，两人结伴，走到长桥甲，突然一棍子从我背后打下来，雨伞都打烂了。原来碰到土匪。土匪以为我是商人，要抓我上山，我说这煤油不是我的，我是教书的。他查我行李只有几本书，说不是商人衣服也脱下来，我被剥得只剩下内衣裤，在长桥甲路上没有一个铜板，看到一个妇女来了，说了情况，她送我一件衣服和一碗稀饭给我吃。后来又遇到一个老头子挑着担子，还带一个小孩，我主动帮他挑担子，到了河田，天就黑了，老头子给我几个铜板住客栈，但客栈不让住，怕我偷东西，叫我住在外面。第

二天才赶到长汀，长汀的总支事先已接到特委的通知，我到学校接头，看门的开了门一看我那个样子把门又关起来，不让我进去，我说是来找段奋夫的。段开门后问我找谁，我轻声漏了一个“罗某”二字，他赶紧请我到里面去，换了衣服，引我进里屋，住了十多天。傅连璋的侄女傅璉玉拿来药给我治疗。在长汀开会时，我记得名字的有段奋夫、罗化成、傅璉玉等。当时长汀敌人强迫农民修公路，拖男带女的，我提出要反抗。在总支会上我介绍了三县农民运动的情况，要他们也组织农民运动。“六大”决议传达后，各地信心很足，表示要继续发展武装游击斗争。我在长汀传达后就走了，于春节后回到厦门，不久听到毛主席率红四军来长汀打了郭凤鸣。

一九二九年春，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胜利进军，开辟了赣南大片根据地，接着转战闽西，第一次是来打长汀，消灭郭凤鸣旅二千多人，占领了汀州城，动摇了闽西的反动统治，对工农群众鼓舞很大，毛主席在汀州工作了十多天后回师赣南去了，第二次是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毕占云同志（当时是毛主席警卫营营长）在《星火燎原》“三下闽西”一文中已讲得很清楚了，当时我们得到的情况和毕占云讲的差不多。三打龙岩很激烈，开始在龙门接触，以后又在龙岩城巷战，最后消灭了陈国辉旅二千多人。陈国辉本人化装士兵逃往南靖。红四军还进攻永定，打败卢新铭，解放永定县城，在永定城开过大会，毛主席在会上还讲了话，鼓舞很大。第三次是攻打上杭，毛主席没去，是朱老总带去的，从漳平方向过来，消灭了卢新铭部队。这一仗也打得很激烈，打进了县城，以前闽西特委领导了三县的游